

一、古人类化石宝库——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

在首都北京西南约 50 千米的地方，有一个普通的乡村小镇，名叫周口店。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它正好位于山区与平原的交界处，北面是峰峦（luán）重叠（dié）的西山，南面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这里很早以前就以出产石灰和煤而著名，是一块风水宝地。

不过，周口店之所以成为世界闻名的地方，主要还是因为半个世纪之前，在这里的一个石灰岩山洞中，发现了我们的老祖宗北京猿人（俗称“北京人”）的化石。你们知道吗，北京猿人遗址，现建有陈列北京人化石的大型陈列馆，1987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93 年秋季举行的全国第七届运动会的“文明之火”火种，就是在这里的猿人洞采集的。

那么，北京人是怎样被发现的，它的发现有什么重要意义？我们的老祖宗长的是什么样，又是怎样生活的呢？下面就听我细细道来。

北京人的发现

北京人的发现可以说凝结着中外科学家的智慧和心血。

首先应提到的是瑞典人安特生。1914 年，他从遥远的北欧来到中国，帮助我国调查矿产。安特生知识渊博，爱好广泛。北京周口店石灰岩山洞里发现有“龙骨”（动物化石）的消息，引起了极大的兴趣。

1921 年，安特生和他的助手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来到周口店，在后来被命名为“龙骨山”的小山上，发现了北京人化石产地。

1923 年，师丹斯基在龙骨山发现了一颗磨损的人类牙齿。1926 年在清理这次采集的标本中又发现了一颗牙齿。同年 10 月 22 日在北京欢迎瑞典皇太子的宴会上，他们宣布了这一发现。这一消息就像爆炸了一颗重型炸弹，震撼了当时的科学界。因为在中国以至亚洲大陆上，从来还没有发现过这样古老的人类化石。

1927 年 3 月 16 日 周口店龙骨山开始大规模发掘 发掘工作由中国地质调查所主持。10 月 16 日又发现了一颗牙齿，经英籍加拿大人步达生研究定名为“北京中国猿人”，俗称“北京人”。

在整个周口店的发掘中，最值得提及的是 1929 年。当时的发掘工作由我国年轻的古人类学家裴文中主持。12 月 2 日下午 4 时许，在昏暗的烛光下，一件奇特的东西出现在人们眼前。忽然有人大叫起来，这是什么？人头！原来这正是人们发现的北京人的第一个头盖骨。此后，又陆续有了很多发现，其中最重要的是 1936 年 11 月，在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的主持下，又发现了 3 个保存比较完好的北京人头盖骨。1937

年 7 月，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发掘工作被迫停止，直到全国解放，发掘工作才又恢复。

解放前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连续 11 年的发掘 共发现北京人的头盖骨 5 个，下颌骨 14 块，牙齿 147 个以及头骨、肢骨碎片等若干。这些化石都保存在美国人开办的协和医学院里。令人痛心的是，这些化石在珍珠港事件前后失落，至今仍下落不明。

北京人化石发现的重要意义

为什么北京人化石的发现在世界上引起如此强烈的震动呢？要理解这一点，先得回顾 100 多年来有关人类起源问题的争论的历史。

人是从哪里来的？大家都知道“人生父母养”这句话。可要追问最初的古人类是从哪里来的，回答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自古以来，世界各地、各民族的人们都在神话传说和宗教故事里寻求答案。其中以“上帝造人”为主题的圣经故事讲得最为离奇生动，对相信宗教的人影响也最大。

最初对神创论提出挑战的是一批业余考古学家。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法国海关官员佩特斯（1788 年～1868 年）、英国地质学家莱伊尔（1797 年～1875 年）、生物学家赫胥黎（1825 年～1895 年）和达尔文（1809 年～1882 年）。

赫胥黎和达尔文，这两位英国生物学家根据解剖学、胚胎学、遗迹器官等事实，证明人和其他脊椎动物一样具有共同的起源，提出人类和猿类的亲缘关系，推论人类是由某种

古猿进化来的。

进化论和神创论对人类的起源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答案。然而，进化论者在当时只能从解剖学、胚胎学等取得间接证据和按照进化原理来论证从猿到人的理论，却缺少化石这样的直接证据。在这种情况下，进化论要抵挡住宗教势力的猖狂围攻，是多么不容易，又是多么需要古人类学和史前考古学的支援啊！

既然人是从猿演变来的，那么，最早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呢？到哪里才能找到它们的遗骸呢？早在 1867 年，德国动物学家海卡尔（1834 年～1919 年）就预言，在化石中一定存在从猿到人的“中间类型”并称这种生物为“不会说话的猿人”。

海卡尔的预言当时被一些权威视为毫无根据的臆测而遭到指责。然而，也有人相信他，并且以他的预言为指导，动身去寻找那“不会说话的猿人”。

这个人就是年轻的荷兰学者杜布瓦（1858 年～1940 年）。

1887 年，杜布瓦不顾亲友的劝阻，毅然放弃大学解剖学讲师的优越职务，以军医的身份去了当时荷兰的殖民地“荷属东印度”即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他起初到苏门答腊，1890 年转到爪哇。他到处考察和寻找化石。他坚信，在大猩猩和黑猩猩生活的热带地区一定能找到猿与人类之间过渡性生物的化石。他的目的果然达到了。

1890 年冬，杜布瓦在中爪哇特里尼尔村附近，梭罗河岸边的火山灰沉积层中，找到一块下颌骨。次年又发现一块头

盖骨。1892 年，在距头盖骨发现地约 12 米处又发现一件完整的大腿骨。这批化石在形态上很特别：头盖骨很原始，和猿类有些相像而和现代人差别很大，但大腿骨却和现代人的很接近，证明它已能直立行走。杜布瓦把这些材料统统归属于一种灭绝了的生物，他把它叫做“直立猿人”。他相信，它就是现代人的先驱，是处于猿和人类之间，但更接近于人类的过渡类型。也就是说，他找到了海卡尔预言的“不会说话的猿人”。

1895 年，杜布瓦携带他发现的化石回到荷兰。然而，等待他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一场论战。当时一些科学家认为爪哇化石很清楚是人的，另有一些人则认为根本不是人的，而是一种已灭绝的大长臂猿的。只有以杜布瓦为首的少数人坚持认为，化石是一种猿和人的过渡类型。

随后的几年中，围绕着爪哇化石到底是人，是猿，还是过渡类型，人们争论得十分激烈。有人说爪哇化石是属于一个“白痴”的，有人则说是属于一个“畸形”（变态）人的，甚至有人说那只不过是一种虚无飘渺的“幻觉”等等。最大的压力当然还是来自宣扬上帝造人的教会。

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处于论战中心的杜布瓦却逐渐退缩，沉默寡言了。为了避免麻烦，他索性把化石带回故乡，撬开屋子的地板，把装有化石的箱子埋到地下，好让世人把它遗忘。此后，这批化石再也不让人看了。直到 1923 年，由荷兰科学院院长出面交涉，一些科学家才得以重睹爪哇化石标本。更为可悲的是，杜布瓦在 20 年代后期发表的文章里放弃了原

来的观点，竟宣称爪哇化石是一种大长臂猿的，与人类无关。这种观点一直保持到 1940 年他去世时为止。

杜布瓦和爪哇人的厄运，是科学史上的一出悲剧。对此，一位美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豪厄尔有一段很风趣的评论说：有一点对杜布瓦不利的是他生得稍嫌太早，这在他是绝对无可奈何的。有时某种新的发现是世界还没准备好接受的，有时甚至连科学也没准备好来接受。再迟 30 年，杜布瓦的生命史也许就会完全不同了。

是谁把爪哇人从厄运中拯救出来，使杜布瓦摆脱窘境的呢？

是北京人化石的发现。北京人本身具有爪哇人无可比拟的优点。

首先，北京人有明确的地层根据——与人类化石共同出土了 96 种哺乳动物化石，由它们组成的周口店动物群，为断定北京人的地质年代（年龄）提供了充分而可靠的依据；其次，北京人遗址不仅发现了 40 多个个体的人类化石，而且还发现了数以万计的石器、骨器和北京人用火所留下的几层灰烬。北京人遗址的发现，为达尔文从猿到人的进化论提供了丰富而无可争辩的证据，平息了关于爪哇人的争论，最后确立了以爪哇人和北京人为代表的直立人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地位。

当然，直立人还并非是最古老的人类，古人类学家告诉我们，最古老的人科动物是腊玛古猿（1400 万年～700 万年）其次是南方古猿（400 万年～100 万年）然后才是直立

人（200 万年～20 万年），往后是以尼安德特人为代表的早期智人（20 万年～5 万年）和以克罗马农人为代表的晚期智人（5 万年～1 万年），最后是现代人。

新中国古人类考古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中华大地上发现了不少直立人化石的遗址，并利用多种更加科学的测试方法对他们生活的年代进行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根据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nài）教授的资料，发现于云南元谋的元谋人，原先根据古地磁测定认为距今约 170 万年，最近确定为距今约 65 万年～50 万年，最早不超过 73 万年；发现于陕西蓝田县的蓝田人距今约 80 万年～65 万年；而北京人则确定为距今约 46 万年～23 万年。1980 年和 1981 年在安徽和县两次发掘中所发现的和县人和北京人的年代相当，体质特征也相似。近年来在湖北郧县和江苏南京又相继发现了直立人头盖骨化石，这证明当时直立人在中国分布广泛。

北京人的相貌

解放前后发现的北京人化石，共有完整和比较完整的头盖骨 6 具、头盖骨残片 8 块、面骨 6 块、下颌骨 15 块、牙齿 153 颗、残破大腿骨 7 段、残胫骨 1 段、上臂骨 3 段，锁骨、腕骨各 1 件，代表了 40 多个男女老幼个体。每件化石都有明确的出土层位，并且每个层位都有丰富的动物化石相伴生。在同一个地点发现如此丰富的早期人类化石，举世罕见。

北京人与爪哇人在分类上都属于直立人（过去叫猿人），是带有不少原始性质的早期人类。北京人的头骨骨壁很厚，前

额低平，鼻子很宽、鼻梁扁平，眉脊粗大、前突，下颚骨大，没有下巴，牙齿也比现代人粗大。北京人的脑量为 915 毫升～1225 毫升，平均为 1059 毫升。比猿类的脑量（最大为 600 毫升）大得多，但只相当于现代人脑量（平均 1400 毫升）的 2/3。

根据这些特点和解剖材料，及由古人类学家制作的复原像，可以看出：北京人身体粗壮，虽不及现代人高大，但肩膀宽阔，肌肉发达；腿比较短，胳膊相对较长，双臂下垂接近膝盖；头部前倾，背有点驼，站立时不像现代人那样笔直。不过，北京人的步履还是稳健有力的，奔跑起来也很敏捷。

北京人的文化及生活

从北京人遗址出土了数量巨大而又内容丰富的文化与生活遗物，主要有石器、骨角制品、用火遗迹及大量动物骨骼等。

石器主要包括考古学家所说的石核、石片和经过加工的砍斫（zhúo）器、刮削器、尖状器等，还有从洞外搬来尚未利用的砾石或石块，总数不下 10 万件。制作石器的原料一般都比较坚硬的石英、燧石、石英岩等，主要取自龙骨山附近的河滩和山区。

骨、角器主要是由鹿的头骨加工成的盛水容器，和用鹿角制成的尖状器，它可以当作槌子使用，也是很好的挖掘工具。

动物骨骼很多，既有田鼠、仓鼠、鸟类的，也有野猪、斑

鹿、水牛、狼、熊和鬣狗的，甚至还有古象的。

根据这些遗物，科学家告诉我们，北京人住在山洞里，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只要能吃的他们什么都吃，绝没有现代人偏食和挑食的习惯。他们除了采摘野果和挖掘可食的植物根茎之类的东西之外，还捕捉蝙蝠、老鼠、鸟类、青蛙、蜥蜴、蜗牛。北京周口店位于山区和平原的交界处，是北部高原山区动物南迁的重要通道。北京人利用周口店北边的山口、断崖绝壁等地形，依靠集体的力量去围捕大型野生动物野猪、鹿、水牛，甚至狼、熊等猛兽。

北京人的用火遗迹是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之一。1930年，裴文中先生在主持周口店发掘时首先发现了黑色灰烬。1931年，灰烬和其中的烧骨、烧石发现得越来越多，北京人用火的遗迹得到了确认，人类用火的历史一下子提前到几十万年前。值得注意的是，灰烬不是平铺的，而是堆成两堆。考古学家据此推断北京人已经具有控制火和管理火的能力。虽然还缺乏北京人已懂得人工取火的证据，但可以肯定北京人已经具有较高的用火能力。火的使用对于人类和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火是人类控制的第一种自然力。火给人类带来光明和温暖，用火抵御和猎捕野兽，烧烤食物增加营养，有助人类大脑和体质发育。

北京人化石失落之谜

1937年以前周口店挖掘出的北京人化石，一直保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室的保险柜里。1941年，太平洋上风云

突变，日美交战迫在眉睫。11月20日，北京人化石分装两个白木箱，准备运往美国保存。12月5日带有北京人化石的专用列车离开北京驶往秦皇岛，打算在那里送上一艘美国定期航轮“哈里逊总统号”这艘船定于12月8日到达秦皇岛。但计划未能实现，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日军迅速占领了包括协和医学院在内的美国机构专用列车在秦皇岛被截，“哈里逊总统号”也没有驶到秦皇岛。从此，北京人化石的下落就成了本世纪世界上的一大悬案。

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的首要目标就是搜查曾保存着北京人化石的保险柜，结果扑了空。接着又派出密探四处搜寻化石，仍不见结果。战后，美国占领了日本，在这个岛国广泛查找，仍然一无所获。

此后几十年，许多不同国籍的学者为寻找这批稀世珍宝而四处奔波，提出了种种猜测。

一种说法认为化石仍在日本，按照当时的计划，木箱准备装上“哈里逊总统号”启运，但这艘邮船刚到天津就遇上开战，成了日军的战利品，化石当然也不能幸免。要不然日本人战后怎么会装聋作哑，不再提北京人化石的事呢？

另一种说法却令人非常沮丧（jǔ）有人推测化石装上了另外一艘船，在赴美途中遭遇海难，随船沉入太平洋底。

最令人兴奋的是第三种说法，几位受命装船的美国军官证实，化石一到天津就被当做行李疏散了，并没有离开中国。还有一名卫兵亲眼目睹有人把大木箱埋在北京美国大使馆后院。如果里面果真有化石那么北京人至今还定居在北京。可

惜，当年的美国使馆旧址，如今已布满了高楼大厦。谁也不能根据传闻，就下决心把那么多建筑拆除。也许随着北京城区不断改造，终归有一天，北京人化石会重见天日。

1949 年新中国建立，中断了 12 年之久的周口店发掘工作又重新开始。1959 年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北京人的下颌骨，1966 年又发现一个北京人的头盖骨。令人惊奇的是，它们和 30 多年前同一地点发现的碎骨模型拼合在一起，正好组成一个较完整的头骨。在我们今天见到的北京人头骨里，它是唯一的真标本。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与印度尼西亚梭罗河谷爪哇人遗址、东非的奥杜威—奥莫河谷猿人遗址一起，成为世界三个最著名的古人类遗址，它既背负了几十万年的悠久历史，又留下了近代沧桑的烙印。来到这里的青少年朋友们，一定会对此感慨万千，铭记这一切的吧。

二、沉睡三千年的帝都——殷墟

在辽阔的华北大平原上，在黄河北岸的安阳市西北郊，流淌着一条小河，名叫洹(huán)水，又名安阳河。宁静的洹水和肥沃的土地，自古以来就吸引着我们的先民在此耕作生息。在洹水南岸，有一个极为普通的北方小村庄——小屯。这里的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平静地生活着。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3000多年前，竟是一个庞大帝国的都城所在地，在他们的脚下埋藏着沉睡了3000余年的中国古代文明。20世纪初，以甲骨文的发现和认识为契机，殷墟，这一商代后期的都城遗址被发现了。这一发现，立刻轰动了全世界。

殷墟的发现

故事还要从头说起。据说清朝末年(1889年)北京一位名叫王懿(yì)荣的金石学家，因病在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中药店买回一剂中药。他意外地发现中药里那味“龙骨”上，有奇怪古拙的各式符号——原来这就是刻在龟甲和各种动物骨骼上的甲骨文。我们中国的中药真是无所不包，矿物、植物和动物，连地下埋了数千年的龟甲和骨头也一样入药，还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龙骨”。就这样偶然地，甲骨文引

起了文人学士的注意。“龙骨”一下子变成了古董，身价顿时百倍，原先论斤称卖的龙骨，竟至计字论价，每字价 2 两银子。商人们屯积居奇，广为收罗并对出产地严加保密。所以直到 1908 年，我国的金石考古学家才探知甲骨的出土之地为“洹滨之小屯”。金石学家研究了小屯出土的 3 万余片甲骨后，确定小屯即为殷墟，尔后进一步证实了小屯就是盘庚迁殷到纣王之灭这 273 年的殷都所在地。古代文明在湮没了 3000 多年后，又一次显示出光彩夺目的魅力。安阳小屯殷墟的发现被视为本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前中央研究院从 1928 年秋到 1937 年春在殷墟一共进行了 15 次发掘，奠定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基础。1949 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不久便恢复了殷墟的发掘工作，为殷墟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经过解放前后半个多世纪的发掘研究，殷墟的范围和布局已基本清楚，学术界对殷墟文化的看法也在逐渐统一或更接近。

就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分析，殷墟的范围东起安阳市西北的郭家湾一带，经薛家庄到北辛庄等地，东西长约 6000 米；南起铁路苗圃，经花园庄、小屯村，跨过洹水到三家庄、武官村北地，南北长度在 4000 米以上。殷墟总面积约 24 平方千米。在此范围内，是殷代青铜器和甲骨出土最集中之地，居住遗址和墓葬群密集。洹南小屯村的东北地是殷墟的中心，殷王室的宫殿宗庙就坐落于此。宫殿外围有规模较大的手工业作坊遗址，洹北侯家庄西北岗、武官村北一带是历代殷王的王陵所在地。围绕着王陵区和宫殿区，有许多分散的居民点。

小屯村西约 200 米处发现了一条巨大的濠沟，已探查了 750 米的一段，沟宽 7 米~21 米，深 5 米~10 米，由西南蜿蜒伸向东北。大濠沟离宫殿宗庙很近并且很规整，看来是人工开挖的城防设施。

殷墟的宫殿宗庙

宫殿宗庙遗址位于小屯村以北，紧邻洹水。宫殿布局周密，在南北 280 米、东西 150 米范围内，集中而规律地排列着 50 多座建筑基址，大致分属 3 个建筑群。北端的建筑群基址已有部分毁于洹水。商王室的宗庙在居中的建筑群内。宗庙西南是祭祀天地和自然神的处所，以一大夯土台为中心，四周对称规则地环绕着 16 座建筑。建筑的特别之处是朝向东西者居多。现存基址的形状多种多样，有正方形、长方形、凹形、凸形和圆形等，还有似桥一般连结两大建筑的基址。宫殿建筑规模大小不一，大者长达 85 米、宽 15 米，小者仅长 2.3 米，宽 1.85 米。

综合 50 余座基址的考古资料，推测当时建造宫殿，是先选址、测定方向，然后在地面量准拟建建筑物的尺寸，依之打地基。打地基的方法是先挖深 1 或 3 米的基坑，然后层层填土、夯实，形成一个夯土台后就可以安置柱础了。柱础用的是天然的大卵石，有趣的是还发现了 11 个铜柱础，有的像烙饼锅，一面平一面凹，建筑上称为铜铎(zhì)。殷墟没有出土瓦件，看来此时的屋顶仍然是草顶。宫殿区以外的房屋基址较小，还有许多半地穴式的遗址，底部平坦，有踏步可下，

可能是奴隶们的住所。

宫殿区内的生活设施完备，地上有用小石子铺设的地面，地下有排水系统。排水用的陶水管排列高低有序，小管之间平口对接而两条管道的交接处则有三个三通水管来连接。种种迹象表明殷墟的城市功能已经出现，从建筑群的分区，到道路、排水系统，应有尽有。在殷墟出土过许多建筑用的大块白石雕刻、精美的柱下装饰、刻花上色的大木板，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堵白灰面墙的残墙皮，它白色底子上绘有红色花纹和黑色圆点，组成形似对称的图案，线条较粗，转角圆钝，这证明殷代宫殿已有了壁画，显示了我们祖先古老的艺术成就，也可看出我国绘画历史的悠久。

豪华的地下宫殿——殷墟王陵

殷代人崇尚鬼神，相信人死灵魂不灭。墓葬是墓主在阴间的住所，也是其生前居住的延续。商王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为了死后能继续享用生前一样豪华的宫殿，所以活着时就驱使大批奴隶营建王陵，以便自己的灵魂在其中骄奢淫逸地生活，并统治阴间的天下。

在洹水北岸，东西长 450 米，南北长 250 米的岗地区域内分东西两区集结了 13 座按一定布局排列的大墓，这就是王陵区。王陵西区有八座大墓，东区除了五座大墓外就是一大片祭祀场。殷王墓被盗的历史很长，墓地中到处可见长方形的盗墓坑、眼。根据发掘来看，殷王陵无一不被盗掘，且随葬品几乎都被盗尽。但仅从盗墓贼遗漏的随葬器物及揭露

出来的墓室结构和规模来看，称它们为“地下宫殿”并不过分。比如王陵西区的 1001 号大墓，是座有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墓，深 10 米多，墓室和墓道的总面积达 713 平方米。墓室中有椁（guǒ）室，椁室的底面及四壁都用木板搭成，木壁极其华美，上刻花纹，颜色艳红，在主要纹饰点线上还镶嵌了野猪牙雕饰品，这无疑是地宫的嵌镶壁画。盗余器物虽不多，但仍可发现不少铜器、玉器、白陶等残片，还有殉葬人骨架 100 多具、马骨架 10 多具。1217 号墓的墓室和墓道总面积达 1800 平方米，深 15 米，工程规模之大，可以想见。巨大的墓室、华美的装饰、众多的殉葬人等，足可以反映商王的骄奢淫逸。

1976 年发现并发掘的妇好墓，在洹南小屯村北偏西 100 米处。没有墓道，墓室面积仅 22 平方米，深 7.5 米，与王陵区大墓相比，规模要小得多，因它不在王陵区，才未被盗挖过。墓壁的东西两面各有一长方形壁龛（kān）其中有殉葬人，棺椁讲究，椁木上覆盖着红黑相间的帐幔，棺木表面涂了红、黑两色油漆，棺底有朱砂。随葬品除 6000 多件海贝外，还有器物 1928 件，仅青铜器就有 468 件，种类齐全，几乎包括了殷墟出土的全部品种的青铜礼器，很多还是成套成对的，至于偶方彝（yí）、三联甗（yǎn）、鸛（xiāo）尊等器形更是前所未见。铜器的数量之多超过了数十年殷墟发掘所得的总和，其总重量达 1.6 吨 其他器物如 755 件玉器等 质量之精 前所未有。

许多铜器上铸有铭文，铭文为“妇好”、“司母辛”、

“好”的占了大多数，结合甲骨文中关于“妇好”的记载，证实墓主妇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她死于武丁晚期。妇好是武丁时的显赫人物，平时主持重大的祭祀活动，战时领兵出征，甲骨文记载用兵最多的一次伐羌（qiāng）战斗，就是由这位3000多年前的女将统帅的。妇好墓是唯一的一座“原封未动”、能与甲骨文相印证并可推定墓主及墓葬年代的商王室墓葬。与诸王陵相比，妇好墓的墓室面积仅是王陵大墓的几十分之一，但墓中的随葬品已是如此丰盛，工艺水平又这样高超，由此推彼，王陵的随葬品的数量、质量就不难想像了。

历史的悲剧——人祭和人殉

人祭就是奴隶主以杀死奴隶祭祀祖宗和神灵。如一块甲骨上就记载，殷代一次祭祀先王就用了“小臣（男奴隶）卅，小妾（女奴隶）卅”，共60人。在殷墟武官村王陵区内，1976年已发现了181个祭祀坑，每坑8个~10个人骨，将近2000人。祭祀坑不仅王陵区内有，在王室宗庙正南也存在有十几排排葬坑，以5个车坑为中心整齐地排列。每坑尸骨不等，或俯或跪，这个祭祀场掩埋约600个冤魂。大规模的祭祀场外，零星的祭祀坑也时有发现，如后岗一个口径不到2米的圆坑内掩埋了54具染有红色的尸骨，显然这些人牲的尸体曾经过今日尚不明原因的处理，大司村一个深约半米的椭圆坑内埋有躯体26具、人头31个。

人祭大多是战俘奴隶，而人殉则是商王和贵族死后把自己生前所有的妻妾奴仆一起埋进墓穴。殉葬对象十分复杂，除